

近两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速放缓。国际舆论也因此担心,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态势,导致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不断加大

“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与跨越

周小兵



视角

结构性改革 成为跨越关键

□ 李正信

当世界经济步入新一轮工业革命之际,人们日益关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态势,相当一部分人担心多数新兴经济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从此长期增长低迷。客观而论,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任何新兴经济体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不但艰巨而繁重,且需相应的国内外条件和时机的配合。从历史的经验判断,要成功跨越,相关新兴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改革是关键。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当一国平均收入水平达到或超过12616美元时,则表明该国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显然,这一定义很难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以俄罗斯为例,尽管其人均年收入2012年已达到14037美元,但因俄经济中的能源比例偏重等原因,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俄罗斯等类似的国家,仍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其中的关键是,如一国现行的中等收入经济乃至社会结构未实现实质性的改革而适应经济的跨越发展,其经济及人均收入增长,仍将长期在中等收入界限上下徘徊不前。由此看来,一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及顺势发展,才是该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从一国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低收入经济体通过对其内部的结构改革和调整,为其从农业及低端工业主导经济,向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发展,提供了必然的条件和保证,从而才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努力和GDP高速增长,使其完成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过渡。之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经济结构就需完成从制造业等中端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向以服务业尤其是先进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的过渡。

从发展的角度看,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是服务业的全球化及数字化。就服务业而言,大体可分为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旅游、运输、文化娱乐、医疗卫生乃至部分建筑领域等,都可归入传统服务业。而电讯、计算机信息业、商业及金融服务、保险、版权及许可制度等,都属于现代服务业范畴。未来的趋势,首先是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和扩展,现代服务业将日益大规模地进入国际贸易领域,如教育数字化已明显推动跨境教育商业化的大发展。其次,传统服务业的数字化程度也将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其潜在国际市场也将随之大规模扩展。

由此看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新兴经济体,需着重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现有中低端工业体系向高端的平稳过渡、升级。显而易见,中等收入经济体普遍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正努力要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经济体,如孟加拉国、越南等经济体,凭借其低廉劳动力优势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压力,尤其是对其中低端制造业的挤压;二是其本身经济结构及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实力,仍明显落后于高收入经济体,从而还无法大规模挤占国际上现有的高端制造业及数字化服务业市场和资金份额。这就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布局经济结构改革时,必须顾及到现有结构所提供的就业及服务等方面的保障。如“休克疗法”等过于激进的措施,不但无益于经济结构的持续性和客观性,且可能给社会带来难以把握的不确定因素。

不容置疑,中等收入经济体在改革中聚焦结构性至关重要。由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社会远不仅是人均收入数字的问题,而是数字差异背后隐藏的经济、技术、资金,乃至管理机制及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从而,改革不作循序渐进的结构性调整,未来的发展就难以持续,中等收入的陷阱就很难逾越。

当前,世界经济界对中国实施结构性改革并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相当的信心。这与中国有30年的改革成功经验及发展成果,以及发展的基本条件优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不无关系。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向世界展现出改革的决心及思路,国际社会相信中国将推出一系列符合实际及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措施,借以开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发展阶段。

即使这样,中国仍不可低估了未来发展阶段的挑战难度。因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但需要经济结构方面的系统调整,还需在思维理念、法律体系,乃至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齐头并进的改革。

历史规律表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升级是发展中的困难阶段。困难的绝对性在于必须依靠自有力量同步完成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社会制度等三个要素全面升级,相对性则在于农业到工业阶段升级借助了发达国的转型红利,使人误认为后工业化社会也可快速降临。真正的挑战是新兴经济体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能靠自己

聚焦



工业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增长机会

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世界银行所称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此发展阶段长期徘徊而未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因而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指以收入水平表示的特定发展阶段积聚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若无法有效克服,就将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实际上,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的特定阶段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增长停滞,只是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进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目前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问题越受关注。

由于世界银行界定的中等收入与高收入之间的收入分界指标接近工业化高峰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折点,因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完成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或称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等)的转型准备期。从这一角度看,工业化的基本进程与其变化决定了社会经济的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业化进程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在战后基本上同步向后工业化社会演进,与之相伴的是它们的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10余年间先后出现相对下降,同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部门或生产过程向外转移,相应腾出了部分国内市场并以进口相关产品满足需求。而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使跨区域的产业转移、中低技术的商品化和向外扩散成为可能。

战后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这一重大变化,给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机会。一方面,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的技术和资本门槛,使其能以较低的成本从外部获得技术与资本品,节约了自己研发的时间与成本,这也是所谓“后发优势”的真正来源。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市场,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这些转移产业是寻求低成本生产的中低技术产业,其产品的竞争优势靠的是低劳动成本或规模化生产所具有的低相对成本,从而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工业化进程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或生产过程向外转移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引进外资、外购技术来加速完成其经济的主导产业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升级,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其条件是要优先发展工业,即动员其社会资源向工业进行倾斜型投入。这种建立在在外源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很快,但其弊病亦很明显,本地研发能力如果没有得到特意扶持就会受到外源技术的抑制,从而削弱对产业结构的自我升级能力。由于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时期向外转移产业逐步减弱,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将越来越多地要依靠自己的研发支持,如果难以自我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将陷入减速或停滞状态。

人力资源具有通过学习而持续升级的特殊属性,这是自然资源所不具备的。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升级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当它们的资源出口足以支付工业化前

半期的进口技术、资本品时,对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并不迫切,因而才会落入需要其自行研发时却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窘境。与之相反,在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只能依赖人力资源的开发,因而可能会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可持续升级的特殊属性,在持续进行人力资源升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较强的自我研发能力。由资源禀赋不同而形成的人力资源开发差距主要表现在教育上,这也是部分拉美国家缺乏自我升级能力而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原因。应特别指出的是,人力资源在各发展阶段都要完成自我升级,这是它与其他两个要素的明显差别,也是应予以持续重视之所在。

社会制度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通过确定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增长进程,它包括经济制度和一些有关的非经济制度,决定着社会资源的投入形式与方向、社会利益的分配等等。当发展中国家借世界工业化进程变化之机而迅速工业化时,需要社会资源向工业倾斜配置,其社会制度体系也会发生相应倾斜。不过,在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国家,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社会制度体系都可能偏向资本以利资源产业的发展,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在工业化中期即可能开始调整其制度体系以利人力资源的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困难与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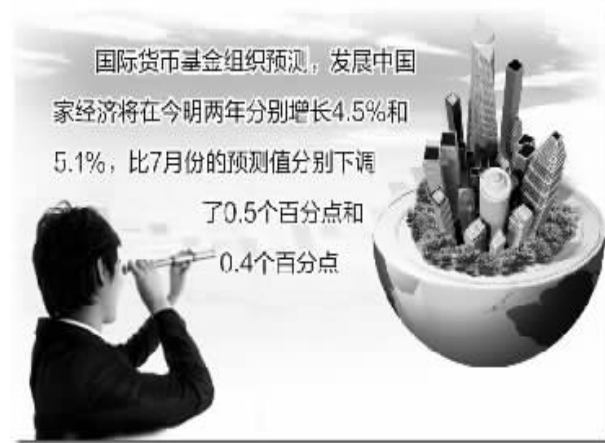
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变化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能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从增长要素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跃出低收入陷阱(即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升级)所需的产业结构升级可以由外

部引进转移产业和技术来解决,它们只需自行解决人力资源和社会制度等两个要素的升级转型。由于转移产业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要求并不高;制度转型的要点是倾斜型发展,即转型可能只涉及部分制度;因而这一转型期所需的要素升级难度相对较低。

不过,当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服务社会转型时,产业升级方向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部分高附加值服务业,所能借助的外来技术支持就相对有限了,发达国家不会轻易将其高新技术向外输出。因而在这一转型阶段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研发能力,同时也必须完成相应的人力资源升级转型;在社会制度方面要从前阶段的倾斜配置资源体制转向均衡配置资源的体制。也就是说,此次转型中必须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三个增长要素的同步升级和转型。从实际发展进程看,只有极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在短期内完成了这三个升级,较顺利地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服务社会阶段,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都出现较长时期的减速甚至停滞。

另外,在高收入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停滞多被认为是因过高的社会福利导致对产业升级的激励弱化所致。由于高福利政策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因而高收入阶段实际上保持产业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持续升级即可基本保持增长,其前提是在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转型时制度体系的调整升级已基本完成。这对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化后的福利政策选择提供了明确的警示。

今天,新兴经济体日益重视自身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型,但能否排除既得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及早实现结构调整,才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走出陷阱:巴西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

本报记者 连俊

今年年初,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曾发布报告指出,2011年巴西人均国民收入总值达10720美元,与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276美元相距不远。如果按近年平均经济增速计算,巴西最快到2016年就将告别持续长达40多年的中等收入阶段,成为拉美地区继智利和乌拉圭后的第3个高收入国家。彼时,拉美地区国家渐次迈过中等收入阶段的迹象将出现。

不过,日前发布的《2014年拉美经济展望报告》却给这一进程蒙上了一层阴霾。报告预测,鉴于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2013年和2014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12年的2.9%,并将大幅低于该地区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4.0%。报告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面临减速风险,拉美需要在不利环境下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生产力和竞争力。不久前,巴西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至9.5%,一年之内连续5次上调利率。作为拉美地

区主要经济大国,巴西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迈出“陷阱”仍存困难。

巴西经济的踟躇不前,与其经济结构问题存在密切关系。社科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员张勇提出,巴西依然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延误。巴西的经济结构存在着四个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巴西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一是内需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偏低。二是外需中过度依赖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易造成周期性波动。三是忽视农业、透支工业造成产业升级无序,并积累了去工业化风险。四是发展模式转变未能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就业创造能力降低。他认为,巴西应抓住21世纪初以来的产业政策回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4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普遍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不过,这种以“举债”为动力,以牺牲农业和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很快走到尽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内需市场逐渐饱和、国际融资变得困难,债务危机便成为拉美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巴西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及时转型,从而延误了历史时机。再看社会财富分配。20世纪70年代巴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社会分配“重增长、轻分配”,不平等现象逐步恶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收入不公格局一度达到顶峰。此后,巴西调整转移支付政策,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加大投入,2000年至2009年,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5.9个百分点。这才迎来走出“陷阱”的曙光。不过数据显示,2012年巴西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52的高位。

对于巴西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国内学界认为对我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社科院拉美所今年的专题报告就指

出,巴西的经历在多方面为我国提供了借鉴意义。首先,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可在一段时期内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可能在某个时点上突然导致经济陷入衰退,其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断崖式”下降,即遭遇“失去的10年”。其次,要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效率。不能以扭曲的价格长期过度使用某些资源。只有适时将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通过改革来消除限制市场机制发挥的体制性障碍,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最终突破这一瓶颈。第三,经济转型应更多地强调“内生”而不是“内需”。经济转型应该是更多地强调内生增长,从供给上采取改革措施。只有这样,把经济增长引向创新驱动的轨道上,假以时日,“内需”便会作为结果自然启动。此外,夯实研发创新能力基础应该作为长期政策取向,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本版编辑 于建东 李红光
版式设计 邵颖